

硝烟中绽放的童年之花

——《小骨朵》创作谈



宋安娜

今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浙江少儿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儿童小说《小骨朵》。这部小说讲述了天津女孩小骨朵成长的故事:二战期间,小骨朵的爸爸因反抗日本侵略者被日本暗杀团刺杀。中共天津地下党安排租住在小骨朵家的犹太医生前往平西八路军根据地送药,支持抗战,没想到日本暗杀团一路跟踪,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就这样打响了。

我从2001年开始寻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天津的犹太难民。有关他们的文字记载少之又少,没有现成的史料可供研究,我只能从那些曾经在天津出生长大、现在居住在海外的犹太人开始。那些年,作为天津日报的记者,我去美国、以色列采访,去日本外务省收集史料,在网上与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的犹太老人们聊他们年少时在天津的生活。他们当时都已是耄耋老人,采访犹如打捞历史沉船。循着他们的叙述,我拎着相机走遍天津小白楼、五大道,去拍摄那些保存着犹太人生活遗迹的小洋楼,去梳理犹太难民在天津的生活轨迹。我惊喜地发现,二战中天津的犹太人曾经积极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战火硝烟中与八路军将士并肩作战。

1939年,奥地利籍犹太医生理查德·施泰因(Richard Stein,后改名傅莱)秘密潜入天津,以在德美医院、马大夫医院化验室工作为掩护,焦急地寻找中共地下党。此时他已经是奥地利共产党员,之所以来到天津,是因为法西斯德国吞并了奥地利,他的名字被列入盖世太保的黑名单,随时有被

曾公祠是目前天津保留不多的古代祠堂之一,建筑面积460平方米。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今存山门、东配殿和正殿。山门、东配殿均为青瓦硬山顶,面阔各三间,进深一间。前檐出卷棚顶抱厦,面阔五间,进深一间。另保存有修建曾公祠碑。碑高2.15米,厚0.24米,首、座已佚。碑文书楷,内容为修建曾国藩祠堂的奏折及皇帝的朱批。河间兵备道丁寿昌、天津知府马绳武著文。目前曾公祠已按照原异地重建至北运河西岸靠近永乐桥的地方,现为红桥区文物保护单位。

作为奉祀曾国藩的祠堂,曾公祠记录了天津的一段历史。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1834年中举,四年后中进士,此后官运亨通,十年七迁,39岁就当上了礼部右侍郎。在十余年的京官生涯中,他温习经史,切磋文艺,研究宗明理学,探讨经世致用,写下一系列著述,在许多领域提出自己的见解。但其一生的“功名”毁于天津老百姓耳熟能详的那场“天津教案”(又称“火烧望海楼”事件)。

自清咸丰八年(1858)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传教士吸收无业游民、恶棍入教,强占民地,激起天津百姓的愤怒与不满。同治九年(1870)“火烧望海楼”事件发生后,英、美、法、比、俄、普、西七个国家一齐对中国发起抗议。军舰聚集在大沽口外,清廷忙派曾国藩处理教案。时任直隶总督(驻扎在保定)的曾国藩接到办理津案旨令时正生病,“重发眩昏”“泄泻不止”。对于处理津案的难度,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此次赴津必定是凶多吉少,但他更清楚地意识到当时局势的紧迫性,案件涉及七个国家,各国军舰环伺大沽口,中国将再次面临战争的威胁。临行之前曾国藩将遗嘱写好,希望儿孙们为他安排好身后事。曾国藩到达天津,民众对他抱以厚望。经过一番“调研”与“斡旋”,就在这年八月,在被调离直隶总督任之前(清廷调他回两江总督任上),这位曾大人终于呈上他议结津案的方案:“一、张光藻(天津知府)、刘杰(天津知县)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二、判处所谓‘凶犯’二十名死刑,充军流放者二十九名;三、赔偿及抚恤共计四十九万七千余两白银;四、派崇厚为特使,前往法国‘赔礼’,并表示中国愿与法国‘实心和好’。”方案一经公布,朝野上下无不哗然,一时间舆论沸腾,人们骂曾国藩是“卖国贼”。朝廷中某些重臣更是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攻击,甚至有人主张严惩曾国藩以谢天下,还有人作对联讥讽他:“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

曾国藩是在同治七年(1868)调任直隶总督的,任期两年两个月,他办理天津教案确实“不力”,但也不能抹杀他的其他“政绩”。在直隶任内,他积极清理狱讼,解决案件长期积压问题;整顿吏治,加强对各级官员的考核,出现“政教大行”的局面;整顿营伍,采用湘军编练整顿练军;治理河道,减缓了水灾的发生;还对盐务进行了清理,使国家盐课正常征收。

曾国藩调回两江总督任后仅一年多,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他“在署内西花园散步,忽呼足麻,端坐而死”,终年61岁。转年三月二十五日,李鸿章上了一道《津郡建曾国藩祠》奏折,备述曾在直隶特别是天津的功绩:“天津为诸河下梢,海疆要地,利益尤多。办理外交涉事件顾全大局,至今咸鉴其苦……凡有裨于国计民生,无不尽心经营,实力兴办,委属有功于民……其在直隶几及两年,政绩实多可传。今津郡绅民追念旧往,吁思祠祀出于至诚。”朝廷准奏后,便选在三岔河口附近南北运河相距最近的地方为其建祠。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曾公祠正式落成。每年春秋两季,由天津河间兵备道、天津知府、天津知县等地方官员来此祭奠。1982年,曾公祠正殿西南角发现一块碑石,系1875年由天津河间兵备道、天津知府、天津知县为建祠而立,该碑现存红桥区文物管理所。

第五三九五期

捕杀的危险。在奥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他紧急转移到意大利,然后辗转来到中国。他到中国的目的只有一个:找到八路军,走上反法西斯战争的前线。

傅莱加入八路军之路并不顺利。他从欧洲乘远洋轮船停靠香港时,听说宋庆龄正在香港,便在停靠的半天时间里下船去寻找。香港那么大,他又人地生疏,结果无功而返。1939年1月15日,轮船抵达上海。上海是当时进入中国无需签证的自由港。傅莱揣着口袋里仅有的5个马克,来到位于虹口的一个犹太难民接待站,运用他的医疗知识为难民服务,同时千方百计寻找投奔八路军的途径。这年春天,为了就近打听八路军的消息,他毅然北上,先后在北平、邢台和天津从事医务工作。1941年秋,经过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他在地下交通员的掩护下来到八路军平西抗日根据地司令部。他见到了聂荣臻司令员,他的名字“傅莱”这两个字,就是聂荣臻司令员按照译音为他取的。

傅莱进入白求恩卫生学校从事医学教学和战地救护。他工作热情高涨,很快就融入革命队伍中。仅用了半年时间,他就能用中国话与战士和农民交流了。由于敌人的封锁,抗日根据地药品奇缺,疟疾流行,傅莱也在打摆子,仍然以顽强的毅力支撑着身体,向中医求救。他找到一套用针灸治疗疟疾的办法,又找来许多缝衣针,到作战部队试验、推广。后来他来到延安,在窑洞里用土法发明了粗制青霉素,挽救了无数八路军伤员的生命,被中国军民誉为“奥地利的白求恩”。

傅莱于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2004年逝世,党龄足足60年,是中共“洋党员”里党龄最长的。我追寻着傅莱的足迹,从他在天津曾经工作过的医院到他居住过的小洋楼,从他战斗过的晋察冀到唐县他的墓前。他留下遗嘱,去世后的骨灰要撒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河北省唐县。仰望着他的半身雕像,一个熠熠生辉的国际主义英雄形象渐渐生成了,他成为我的儿童小说《小骨朵》里老斯的原型。

巧得很,我的母校天津耀华中学第三任校长赵天麟(1886—1938)也是一位抗日英雄,至今,校史馆门前矗立着他的雕像,展厅里他的手稿、他拟的校训、他勤勉校务的老照片,都静静地陈列在展柜里,穿透历史风云,将那个民族危亡、烽烟四起的年代拉回到我眼前。

赵天麟早年就读于北洋大学堂法科,1906年作

为北洋大学堂首批官费留学生,赴美留学就读于哈佛大学,1909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于1914年出任北洋大学校长。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因抗议北洋政府通过校方镇压组织游行、罢课的学生,愤而辞去校长职务。1934年任天津市耀华学校校长。1937年,日寇侵占华北,日军飞机炸毁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致使大批学子失去学业。因耀华学校地处英租界,日寇不能骚扰,赵天麟顶住种种压力,克服重重困难,征得学校董事会的同意,在耀华学校开设特训,招收失学学生1000余名,南开中学大部分教师也转到耀华学校任教。天津沦陷后,日伪政权推行奴化教育,赵天麟坚决抵制,邀请了一些校长、教师秘密集会,一致决定:各校仍然使用原教材,不更换日伪教材;各校抵制日本商品,不买日本商品;各校适当增加军训,抗日到底,不做亡国奴。他还多次将被日军列入逮捕名单的爱国学生保护起来,并通过英租界工部局向外输送,甚至送到抗战的大后方。赵天麟的抗日义举得到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引起日伪当局的极端不满,他们称耀华学校为“抗日大本营”,并称耀华学校地下室藏有枪支,几次要求进校搜查,被他严词拒绝,由此日本暗杀团便伺机对他实施刺杀。

1938年6月27日上午7时20分,同往常一样,赵天麟告别家人,与随身警卫从英租界伦敦道昭阳里2号(今成都道73号)家中出来步行上班。刚要出门时,赵夫人在后面叫住警卫交代事情,赵天麟便一个人先走了出来。刚走出不足百米,对面来了两个学生打扮的人。他们骑着自行车,行至跟前,突然从怀中掏出手枪,对准赵天麟连发数枪,赵天麟的胸部、腰部连中四弹,应声倒在血泊中。

我在耀华校史馆里久久地徘徊,心潮澎湃。突然,展馆中一个展柜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一只一人多高的玻璃柜,里边展示着赵天麟校长在哈佛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穿过的博士服。袍子双肩撑开,就仿佛有个人站在那里,就仿佛赵校长就站在我面前。是的,战争已远,硝烟散尽,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仍然激励着我们,以国际关怀的襟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正鼓舞着我们,就这样,《小骨朵》里的人物小骨朵、老斯、赵校长、店长爷爷和住在伦敦道的那些义气干云的天津人,便来到了我的面前。

过去的英租界伦敦道如今叫成都道,我的家与它只隔两条街;当年小骨朵跳房子的马路,现在印着我来来往去的足迹;小骨朵跟爸爸妈妈看马戏的民园,现在是我清晨散步的所在;从我家走不足一千步,便能来到傅莱故居。每天,每天,穿行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沉浸于红色血脉鼓荡的激情中,我的写作是完成一个心愿,还原真实于故事之中,让作品更加厚重、可信;以真挚动人的亲情、友情,让故事更加触动人心,回味悠长;让童年之花于硝烟中绽放。希望我的创作能承载起抗战先辈赵天麟和傅莱的初心,在孩子们心中播撒下红色的种子。



津湾广场生生不息(水彩画) 叶武 文并图

津湾广场位于和平区海河南岸,与天津站隔河相望,商业配套齐全,具有浓郁的欧式建筑风格。我的这幅画,背景将天空与摩天大楼统一整体渲染,用笔触捕捉前景建筑轮廓与海河波光的交融,着重刻画高年的钟楼,整体画面展现出津湾广场起伏错落的天际线。画作整体彰显了开放包容、中西文化交汇的时代特征,以及城市生生不息的活力。

诗二首

张峻屹

秋兴

(一)
高天浮白云,碧空莺乘风。
绿柳寒蝉嘶,从草蛩虫鸣。
麦苗翠且茂,大枣日渐红。
辛劳终当报,旷野笑语兴。

(二)
秋风秋雨频,打叶何时尽。
瓜果累累日,稻黍籽满身。
四野声不断,乐哉农家人。
清香随处散,欢歌遍地吟。

白露索句

丹枫生白露,新知秋光美。
几番树雀闹,顽童闹野奔。
鸿雁疏然过,偶闻鸣声悲。
莫负好光景,残暑更宜人。

退休后,打理家务成为我的主责。一天,从床底翻出一只大提袋,里面塞满本子和稿纸。这是十几年前搬家打包放置的,一直没工夫收拾,借此暇日正好清理清理。其中有20多本日记,记录着我从上中学到入伍前的青涩岁月。翻到上世纪90年代初,向恩师鲁藜求救的一幕幕情景从褪色的字迹中浮现眼前,恍如昨日。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中,文坛百家争鸣,充满生机,文学梦成为许多青年的人生追求。当时十七八岁的我也被文学“撞”了一下腰。通过亲友牵线,我有幸认识了著名童话作家柯玉生老师。柯老师认为我更适合写诗,便要带我去拜访著名诗人、时任天津市作协名誉主席鲁藜先生。

1990年5月的一个周末上午,我和柯老来到睦南道的一栋老砖楼下,鲁藜先生亲自迎出家门。老人家七十有六,身量不高,很瘦,旧而整洁的衣裤穿在身仿佛挂在衣架上。满头银发茂密蓬松,随意往后背着,消瘦的脸颊虽布满皱纹,但鼻梁高挺棱角分明,依稀显露出青年时代的俊朗潇洒之姿,浓眉下双目明澈,流露出旷达儒雅的神采。待我们落座后,鲁老赶忙拐进厨房,说灶上煮的牛奶溢出锅了,稍等。那会儿鲁老夫人刘颖西女士上街买菜还没回来。

环顾四周,在陈旧局促的两室单元里,一间卧室、一间书房,家具摆设非常简朴,打理得干净整洁。书房兼做客厅,占据半壁的大书柜里整齐摆放着书籍,靠窗的写字台上堆着厚厚的稿纸。书柜对面的墙壁上挂有一幅铅笔素描:广袤苍凉的大地上,一个农夫扶犁挥鞭赶着马儿奋力耕耘。

煮好牛奶,鲁老又忙着为我倒水泡茶。交谈中,鲁老说着略带闽南口音的普通话,逻辑清晰生动幽默,偶尔还冒出几句不很标准的天津方言,让听者如沐春风。柯老将我拜师求救的愿望说明后,鲁老欣然应允。我们临走时,他将新出版的回忆录《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送给我,嘱咐常来走动。打那之后,我便成了鲁老家的常客,隔三岔五带着诗稿登门求救。

到鲁老家拜访的客人中,既有官员、文艺界人士,也有售票员、车间工人、公司职员等和我一样的草根文青,鲁老皆一视同仁,真诚相待。著名魔术大师曾国珍先生是鲁老家的常客。记得曾老爷子身材消瘦精神矍铄,85岁高龄还登台表演。出行时骑辆小三轮,蹬得嗖嗖飞快。虽然身世不同,人生轨迹各异,但共同的情怀,相似的际遇让二老成为知音挚友。是啊,灵魂相似的人自然会聚在一起。

有一回,二老聊起了魔术。鲁老道:令尊当年帮助蔡锷将军从老袁眼皮底下逃离北平;你在长沙和薛岳结下了梁子,被通缉追杀,乔装改扮巧奔妙逃虎口脱险。难怪你的魔术表演多变活人多乐呵……听着二老唠嗑,史料中的铅字瞬间变成了活生生的影像,远比大片更精彩震撼。

在鲁老家,时间总是过得飞快,不知不觉中就到了饭口,鲁老便留我一同用餐。刘阿姨既得厅堂又下得厨房,在主客谈笑风生中端上了饭菜,虽无七碟八碗的丰盛,但一荤一素的搭配,令人吃得开胃舒心。有一天又到饭口,鲁老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他学会了一道菜——大白菜炖回锅肉,特好吃,现在就厨露一手。鲁老像模像样地系上围裙,把煮好的五花肉放在案板上一片片切好,躬着瘦瘦的脊背凑近锅台,待油滚热后把肉片倒入锅中,只听刺啦一声满锅油花暴起,几滴油点子溅在他那骨节突起、筋脉纵横的手上。刘姨赶紧拿湿毛巾擦拭,心疼地数落老伴儿总是笨手笨脚。鲁老咧嘴笑笑,那表情仿佛一个捣蛋的小学生被班主任逮住个正着。鲁老悄声跟我“抱怨”,你这位刘姨管得严着呢。以前有个习惯,每天早晨5点左右醒来,就点燃一支烟,边抽边构思创作。结婚后,在刘姨的严格管控之下,硬是把几十年的烟瘾戒了。

待火候够了,鲁老翻了两勺豆瓣酱,加上辣椒面翻炒拌匀,随后倒入大白菜,盖上锅盖慢炖。操作时那一丝不苟的神态和他提笔写作时简直一模一样。肉的油香和菜的清香,混合成浓浓的烟火气溢满房间。半小时后,这道菜就上桌了。

一大盘热气腾腾、红亮油润的回锅肉,

就着米饭越嚼越香回味无穷,真是一道难得的美食。看着我大快朵颐的样子,老爷子露出慈祥的笑容,如同又完成一部得意之作。他不断给我夹菜添饭,说年轻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得多吃。吃完了还让刘姨再盛一饭盒,让我带回去给家人尝尝地道的“鲁记回锅肉”。后来我也试着按同样的食材、配料做这道菜,却怎么也做不出鲁老烹制出的味道。

鲁老对我们这些后生晚辈给予无私的扶持和提携。每次携文稿登门求教,老人都戴上花镜认真阅读,一笔一画地圈圈点点。既肯定了我的文笔,更一针见血指出硬伤——没有生活。那时的我只浮于文字表层摸索诗意,纠结于“诗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与“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在两种对立的创作理念之间茫然无措。对此,鲁老说:“现在要写的还是很多的,但首先要真正有感受而发,这需要去热爱生活,从这片土地,从亿万人民那里汲取诗情,从细微处挖掘诗的金子。同时,要下功夫锤炼写作技巧,将世间的真善美通过鲜活灵动的文字跃然纸上。从事文学创作是很苦的,一切美的东西都需要经过一番卓绝的努力才能获取……”

鲁老强调,创作不能闭门造车,写出好诗就要不断突破自我、勇于创新,走出去多交流。他给米斗老师写信,推荐我加入昆仑诗社。为帮助我进一步拓宽视野,鲁老又让我参加《人民文学》等国家级文学期刊组织的笔会,与当代文坛名家面对面面言谈。一年多过去了,我的诗歌创作有了明显的长进,作品还入选了《中国当代青年诗人诗选》。为激励我的创作热情,鲁老承诺,等我完成第一部诗集他给作序,并推荐我加入作协。

然而,现实却让我与咫尺之遥的文学梦擦肩而过。由于命运齿轮的阴错阳差,我中专毕业后工作却泡汤了。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我第一次感到那种坠入谷底的失落与无助。参军吧,鲁老拍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鼓励我:用青春热血回报祖国,才是人生最豪迈的诗篇。到军营这个大熔炉中千锤百炼,来一次脱胎换骨的重生。鲁老将珍藏的一本纪念册送给我,在扉页上题写了他的诗歌代表作《泥土》。

带着恩师的期望与嘱托我投笔从戎。在三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每当遇到沟沟坎坎,便想起鲁老的谆谆教诲,他的诗与人生所立起的精神丰碑,像一道光穿透黑暗,引我前行。到了知命之年,虽然尚未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但在岁月的沉淀里,慢慢领悟了生活的本真。其实生活就是一首永远写不完的诗,无需刻意雕琢而自成韵律,在苦辣酸甜中浸泡,在寒来暑往里坚守,在波峰浪谷间扬帆。

题图:鲁藜先生给本文作者的题字和信

怎么给诗人分等级

汪金友

沧等。列为“下品”的诗人,共72人,有班固、邴炎等。很多人都认为,田园诗人陶渊明应该列为“上品”。他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堪称绝世佳作。可能在钟嵘眼里,陶渊明有“躺平”之嫌。那么大的才华,不出来点事情,只躲在山沟里喝酒养花,有点人生颓废的嫌疑。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长葛市)人。兄弟三个都聪慧好学。南朝齐、梁时,钟嵘担任过县令、参军等职。后因写《诗品》,得到会稽太守王元简的赏识,让他担任宁朔记室,专掌文翰,相当于办公室主任。

一个市级的办公室主任,竟敢给几百年间的诗人分品排位,这胆子也够大了。有趣的是,钟嵘的《诗品》,虽然也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但却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和《文心雕龙》一起,被后世学者誉为文论史上的“双璧”。正如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所称赞的,《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

我在想,今天的诗境,多么需要有一个或几个“钟嵘”这样的人物站出来,将一将,分一分,评一评,给全国的诗人定个位。

拾柴篇